

# 亚太地区新移民：促进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

斯蒂芬·卡斯尔斯

过去二十年亚太地区发生了巨变。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地区在经济、人口、政治、社会等方面所经历的变化之快、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造成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流动人口激增。一国之内，有城乡区间移民，昔日各据一方的民族语言以及文化群体杂处混居；各国之间的移民亦是有增无减，形形色色。

人们或是迁移邻国，或是远走天涯，或是做工，或是经商，或是从事专业技术，或是投亲靠友，或是当难民。决策者们总是想把他们分门别类，但是移民的动机极其复杂多样，此事谈何容易。家庭和社区网络起着主要作用，移民工人和难民中妇女的人数都在增加。移民的链条一旦开启，怎样发展便不可预测，结局常常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这种迁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研究者、决策者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控制机制以及经济方面。但国际移民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对移出国和移入国社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移民产生于全球化及其经济变化，同时形成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卡斯尔斯和米勒，1993年）。亚太地区演变的一个主要方

面便是，人们的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鉴于这种形势，一些学者决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规划(MOST)下设一亚太移民研究网络(APMRN)。该项目集中从社会、政治两方面考察国际移民。考虑到该地区版图广大，性质各异，故决定首先将范围缩小到东亚、东南亚、澳大利

亚以及西太平洋群岛。网络于1995年开始工作，如今已在10个国家以及太平洋群岛和香港设立了研究机构。本文将介绍网络所研究的问题和取得的进展。

## 新移民的出现

亚洲移民并非始自今日。中亚的西向移民创造了中世纪欧洲历史，而商贾进入东南亚也已有若干

世纪。殖民时期，欧洲列强属国数以百万计的包身工被招(有的是武力强迫)到其他地区或大陆。19世纪，大批中国人和日本人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19世纪80年代实施了歧视性法案以防止这些移民。这种限制以及其他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使20世纪上半叶亚洲移民几无发展①。

斯蒂芬·卡斯尔斯是澳大利亚隆贡大学社会变迁与紧急情况研究所(NSW 2522, Australia)教授。目前主要研究移民国家公民身份的变化以及亚太地区新移民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最近发表的著作有《移民时代》(1993年)、《笑口獠牙：澳大利亚多文化中顽固的种族主义》(1996年)。通讯处：Professor Stephen Castl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NSW 2522, Australia. Email: stephen-castles@uow.edu.au.

70年代,亚洲骤然浩浩荡荡重返世界移民舞台,这与后殖民时期工业化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方通过贸易、援助、投资对该地区的渗透,创造了移民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资本。工业化及“绿色革命”摧毁了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驱使人们离开农村去寻找更好的安身之地。政治动荡、内部冲突以及战争(如越南和阿富汗)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流动;一些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另一些地区的经济停滞,造成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先是流向海湾产油国,然后是亚洲内部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与地区。

没有什么特别的制度监测亚太地区的人口流动。到90年代中期,估计有300万亚洲人不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还有300万人在其他大陆工作(马丁等,1996年,第163页)。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家属。非法移民的数目只能估测,想必超过了合法移民。移民的情势因“移民业”即大量移民代理、招工的出现而更趋复杂。这些人通过跨国网络组织迁移,政府很难控制。有的经办人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相牵连,从事非法移民的偷渡,剥削工人,为性行业招揽从业人员,虐待妇女儿童。

移民的日益女性化是过去十年的一大趋势。90年代中期,约有150万妇女在国外工作。迁徙中的女性人数往往超过男性。女性移民主要从事一些“典型女性”职业,诸如家务、娱乐(娼妓的雅称)、餐饮、旅馆、服装、电器组装之类。这些工作收入微薄,条件恶劣,地位低下,与男权社会要求女性谦恭依顺的成见正相适应(林和奥伊施,1996年)。

## 亚太地区的移民系统

许多国家拥有各式各样的移民,每种移民都有其独特的原因、特征和结果,而社

会科学家总是把这些移民看做“移民系统”的一部分。迁徙以及其他流动将一些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便构成了“移民系统”。所谓“移民系统”的说法,就是既要关注移出地区,又要关注移入地区,全面考察影响移民的各种因素,研究地区与地区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联系。影响移民决定和居住形式的“宏观因素”(如经济结构、法律、管理机制)和“微观因素”(如家庭社区网络)都需要考虑(克里兹等,1992年)。亚太地区的移民体系主要包括:

- 前往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移民;
- 前往海湾产油国的合同工;
- 亚洲内部的劳务流动;
- 高素质人员的流动;
- 难民及寻求避难的流动。

流动始于自发的劳动及合同工的迁徙,后又加入其他移民,如为家庭团聚、寻求避难、永久性移民,等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时受到多种移民的影响。移民的日益多样化说明,移民是一个自身出现了动力的社会过程。下面将简要讨论各种移民系统,分别举例说明②。

## 前往西方国家的亚洲移民

前往西欧的亚洲移民数量有限。1945年以后,英、法、荷前殖民地向这些国家的移民,到70年代便停止了。最近出现了来自亚洲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后者例如移民意大利的菲律宾保姆)。80、90年代,则有越战后的难民和寻求避难者流入西欧。

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移民,其共同点是:都始于60、70年代歧视性限制废除之后,另外也都受到印度支那难民流的影响。主要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规模之大,出人预料。移民的原在国大致相

同,只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和香港越发侧身其中。最大的一次移民是移往美国,始于1965年移民法颁布之后。来自亚洲的移民数量稳步增长,90年代初达到350 000(欧佩克,SOPEMI,1995年,第236页)。自1978年以来,亚洲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在移民总数中的比例高达40%—50%。1990年,亚裔美国人有690万,到世纪末将增至1 000万。

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形与美国类似。90年代,澳大利亚大约有一半的新移民来自亚洲。1994年,该国的亚洲出生人口估计为826 000(占人口总数的4.6%)(NMAC——“国家多元化顾问委员会”,1995年,第1卷,第3页)。前往加拿大的亚洲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菲律宾、中国(大陆)、斯里兰卡和越南,80年代有所增长,90年代初占了新移民的一半。据1991年的人口统计,加拿大的海外出生人口总数为430万,来自亚洲的就超过100万。由于70、80年代太平洋群岛的移民以及90年代的东亚移民,新西兰的民族构成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 前往中东的合同工移民

1973年油价上涨后,大批移民迅速流向中东。劳工最初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到了80年代,也有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的劳工,此后还有孟加拉、斯里兰卡劳工。1985年,有320万亚洲人在海湾国家做工,其中200万以上在沙特阿拉伯。1985年以后油价大跌,劳工的招募也随之萧条。不过,到90年代初,移民的规模又恢复了昔日的水平,1991年有933 000亚洲移民来到海湾地区。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迫使约45万亚洲人在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返回祖

国。战后,又再度大量招募亚洲劳工(阿贝拉,1995年)。

70年代的移民多为受雇于建筑工程的男性劳工,其中半数为无技能工人,另一半为有技能工人和经理、会计师、工程师之类的专业人员。菲律宾、韩国甚至中国等劳务输出国政府都向海外拓展劳务市场。80年代以后,建筑行业暂时疲软,移民因此而转向服务行业。对家庭佣工的大量需求导致了菲律宾、印尼、泰国、韩国、斯里兰卡合同劳工移民的女性化(斯凯尔登,1992年,第40—41页)。

前往中东的移民被限制在严格的合同劳工制度之内:工人不得定居或携眷属,也不享有公民或政治权利。他们常常被隔离在各工棚内,如果犯有错误,便可能被遣返,工作时间一般都很长。许多家务女工遭到性侵犯。劳务输出国政府认为移民事关发展,这不仅是因为移民能减少失业并提供训练以及工业经验,更重要的是劳工们的汇款,它已成为各有关国家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

## 亚洲内部的劳务移民

8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盛产石油的文莱,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生率下降,因此需要大量的移民劳动力。马来西亚和泰国既是劳务输出国,又是输入国。在几“虎”的经济飞速增长过程中,移民劳工一直承担着本地人越来越不屑的“三D”即所谓脏(dirty)、险(dangerous)、难(difficult)工作。例如在新加坡,30万外国工人占去了劳动人口的19%(休格特,1995年,第625—626页)。外国男子从事建筑、造船、交通和服务业,而外国女人则主要从事家庭及其他服务业。即便是在规模大得多的

日本、马来西亚的某些经济部门,外国工人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亚洲国家政府多将移民视为临时工人,给予他们很少的权利,既不让其安家落户,也不许亲人前来团聚。外国劳工的结构性依赖及其居留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接受国最为担心的问题。例如日本政府为维持民族的单一性,否定一项关于外国劳工的政策,只是为应付劳动力的强烈需求而采取若干权益对策,如招募日本血统的拉丁美洲人或外籍“受训者”。新加坡政府向外国工人课税,藉以拉平外国和本国工人的成本;还规定了各产业中的外国工人比例,无技能工人必须定期调换,不得定居,不得携妻带子,不得嫁娶新加坡人,外国女工还必须定期接受受孕检查(翁,1996年)。与此同时,新加坡想方设法从香港及其他地区招徕华人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

马来西亚政府十分关注移民将会给本国复杂的民族构成(56%马来人,33%华人,10%印度人以及其他)带来什么影响。政府官员似乎更乐于忍受印尼而不是菲律宾或缅甸的非法移民,因为前者在文化和宗教上更接近作为多数的马来人。1995年,在马来西亚注册的外国工人为533 000,其中253 000来自印尼,其余主要来自孟加拉、菲律宾和泰国(休格特,1995年,第525页)。1996年,马来西亚开始沿北部的马泰边境修建长达5 000公里的边境墙,以阻止泰国非法移民入境。1997年初,政府宣布大规模遣返200非法移民的计划(不过真正驱逐的数目相对要少),指责他们造成犯罪、疾病和道德败坏。将移民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在整个亚洲是一个新趋势。

前往各“虎”国的劳工来自经济不发达而劳动力持续增长的国家,如中国、南亚国

家、菲律宾、印尼。菲律宾在现代是一个劳务输出国(就像上一代的意大利),有400万人散处世界各地(巴蒂斯达拉、帕加诺尼,1992年)。他们当中的一半永久定居美国,另一半则在海湾以及亚洲国家做所谓海外临时合同工(OCW)。菲律宾的外移人口仍在增长。1994年,共有565 000工人被招募到其他国家工作,另有154 000人在外轮上当海员。劳务输出对于菲律宾的经济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劳务输出,菲律宾的失业率会上涨40%。1994年,移民的官方收入达29.4亿美元,填补了50%的外贸亏空(阿姆贾德,1996年)。

## 高素质移民

专业、管理、技术人员及其他高技能人员的迁徙也在增长。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专业人员到国际劳务市场上寻找工作,为更高的报酬走南闯北。移民入境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越来越重视高技能和商业移民,不惜使出各种引诱手段。目前,一个高技能人才的国际市场正在形成,亚洲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人才产地。技术移民的一个形式是所谓“人才外流”,即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迁移到发达国家。这对于养育教育了这些人的贫穷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经济损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移民在自己的国家找不到工作。他们的汇款对母国大有益处,而他们最终携带技术经验归来,也有利于技术的转移。不过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人才外流破坏了人才供应。一些国家政府已采取措施鼓励高级人才永久或短期回国。国际移民组织(IOM)启动了一项“高质量人才回归计划”,鼓励移居海外的高技术人才永久或短期回国。

更高级的移民包括阿普尔王德(1989

年,第32页)称做“专业过客”的那些人,即由公司派驻海外分公司及合资企业的管理和专业人员,或国际组织派出从事援助项目的专家。80、90年代,高技术移民剧增,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迁徙在很大程度上是短期性的(数月至一二年),它造成了像日、美、西欧等高度发达经济间的人员交流。不过,有些高技术移民却是工业国家公司在不甚发达国家投资所带来的结果。例如日本的海外投资便导致了经理和技术人员的大量流动。被卷入到这一流动过程中来的人员包括经理及各类专业人员,还有企业家。

技能移民即便是短期的,也会产生重大的非经济影响。来自海外的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变革以及城市化。“专业过客”不但是经济变化的代理人,也是文化价值的载体。他们建立起的联系鼓励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前往投资国去寻找训练和工作的机会。许多专业人员携家带口,这又引出了教育与社会需求,而且导致了长期定居。

## 学 生

近年来许多亚洲人前往发达国家学习。例如1994—1995年就有10万外国学生到澳大利亚求学,其中多数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地区、韩国和日本(BIMPR,1996年,第39页)。发达国家在向亚洲推销教育时颇有一番竞争,目前的趋势是同亚洲的大学联合办学。学生向发达国家流动也可以说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人也许不再回来(斯凯尔登,1992年,第35—37页)。不过,作为发展援助一部分的奖学金计划常常包含了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的法律规定。需要将学生的流动看做更普遍的联系如专业移民、资金

流动的一部分。从长远看,学生的流动可能会在技术转移和文化变迁中发挥作用。

## 难 民

全世界27万难民以及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UNHCR)所关注的其他人,有1/3根在亚洲(UNHCR,1995年,第247页),其中有200多万是1975年越战结束后逃离越南、老挝、柬埔寨的,100万定居美国,而定居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西欧国家的则比较少。苏联1979年武装干涉后,阿富汗1800万人口中的1/3逃到了国外,其中大多数在邻近的巴基斯坦(1989年为360万)和伊朗(200多万)。除了这两次大的流动,还有许多小规模出走。后者虽然人数有限,但给当事人造成的创伤却是巨大的。

亚洲的经历说明了难民状况的复杂性。它不单单是个人政治迫害问题,经济和环境压力尤其起了重要作用,长期的民族和宗教差异则更使冲突加剧;而贫穷专制国家资源匮乏、人权没有保障;所有这一切更妨碍了难民问题的解决。如果难民找到了天堂,有了适宜的食住和基本的教育保健,他们就不大愿意重返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家园。与劳工移民相同,难民的流动也是目前亚洲社会大转型的产物。

## 政府与社会做何反应

亚洲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家对移民现象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对该地区移民的一般看法,即把移民看做“瞬间神话”,认为移民是受短期经济考虑的驱动,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因此,无论是政策还是研究,都把目光集中在移民的规范和劳务市场这类问题



来自印尼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见于马来西亚的巴西古当港。 路透社纪明莱摄影/MAXPP 社供稿。

上。不过，移民永久定居的趋势在许多地方已经显露出来，对输出和输入社会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已有几个国家用限定逗留时间、否定移民权利的办法来防止定居。但是，试图控制移民的政府常常会发现，其政策不是失败，就是带来意料之外的恶果。例如，限制合法移民或是引出了非法移民，或是促使劳工迁延不去，接妻迎子。否定移民权利还导致了社会分化、社会冲突。无意尊重国际人权规范的集权国家如海湾产油国，是完全能够阻止劳工家庭团聚、永久定居的。但许多亚洲国家的公共政策却越来越以法律规则、国际标准为基础。如此便很难否定移民的基本人权。当移民逐渐获

得居住和团圆的权利，永久定居便难以防止了。

输出国政府试图规范移民以保护劳工的利益，并保证汇款通过官方渠道。例如菲律宾设立了海外就业处、海外劳工福利处，前者负责招工，后者以保护和帮助合同工(OCW)为职责。1995年，菲律宾公众对移民问题的关注程度达到高峰。是时，一个菲律宾女佣在新加坡被判谋杀罪而处以绞刑。此案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并引出了关于菲律宾每年70万国外做工者处境的激烈辩论。菲律宾政府禁止本国工人移民新加坡(但经常被钻空子)，并且采取措施改善信息和保障系统。1995年，菲国会通过《移民劳工和海外菲律宾人法》，加强

对海外合同工处境的监测 (利姆和奥施, 1996年,第106页)。

上述事例说明了向外移民的人文代价。问题在于国际劳务移民的市场力量掌握在招募国手中。输出国政府官员常常感到,对不择手段的代理人、胡作非为的雇主无可奈何,这些人均有接受国警察和官方作后盾。移民流动一旦开始,由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加以控制的任何企图都不敌移出移入区间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而人们正是在这种跨国的家庭和社区网络内迁徙。移民决定基于家庭生存的微观理性,而不是国家或经济的宏观理性(雨果,1994年)。要制定有效的政策,需要将移民作为长期的、与全球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过程来理解。每一个人的迁徙都会影响到他的家庭与社区。

同时,接受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也会受到影响。跨国社会网络成为信息、思想、货币、财物、人员流通的渠道,在社会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于这些网络如何运作,如何影响家庭、妇女角色、群体关系、对变化的态度、世俗化、商业化、传统的瓦解以及文化认同的丧失等等,人们不甚了了。同样,对于移民以及定居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如劳动市场的分裂、居住的集中、群体间的冲突,也还没有做过较深入的研究。

与北美、西欧、澳大利亚等有大规模长期移民经历地区的情况相反,亚太地区缺乏对移民的社会政治分析。在北美等地区,由于有了管理定居和协调多民族的公共政策,社会科学家得以从事研究,政府和国际组织也进行政策分析。亚太地区的研究不妨以其他地区的经验为起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走同样的道路。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从事移民研究,只是缺少国内国际的协调。统计资料

一般不大可靠。目前急需开展全国、地区以及国际性的合作研究。

## 亚太移民研究网络 (APMRN)

参加 APMRN 的学者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让人们明白移民以及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亚太地区社会转型的因素将会长期发生影响。目前,该网络包括澳大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香港地区、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sup>③</sup>。一些太平洋群岛国家也通过南太平洋大学的各个分校被网罗进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希望会有更多的国家参加。

APMRN 的具体目标如下:

1. 就移民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政治方面做比较研究;
2. 通过交流思想、国际会议、人员培训、研究生课程,推促本地区研究的发展,提高移民和民族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水平;
3. 使潜在的研究成果使用者(特别是国家政策制定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参与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包括方案设计、实地考察、分析以及成果的传播;
4. 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提供咨询服务;
5. 帮助提高国际移民资料搜集、储存及分析的质量,鼓励并方便网络参与国资料共享。
6. 开展跨地区移民研究,使之成为应对变化的手段之一。

APMRN 包括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它将在每一个国家建立全国移民网络,以促进研究,联系学者。这将有利于信息共享、研究训练以及

合作研究。研究将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次上进行，选择那些能够涵盖本地区移民最重要社会经济影响的课题。除了（南亚等地区）移入的移民，研究也将涉及本地区移出、生活工作在其他地区（如海湾国家、美国）的移民。

APMRN 正努力使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其他研究成果使用者参与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研究成果将为改进有关移民管理以及民族多样性的政策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可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各国的民族委员会进行这样的合作。网络已同亚洲发展银行（ADB）、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等地区组织进行了联系。在全球层面上，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社会转型管理规划的其他项目进行合作，其合作对象还包括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人口局。

## 研究问题

以下是 APMRN 的若干研究问题：

涉及移民输出国的有：

- 出境移民对社会结构以及群体关系（包括当地人、少数民族）、地位有何影响？
- 出境移民对两性关系、代际关系有何影响？
- “移民业”扮演何种角色？
- 出境移民如何同家庭及原社群保持联系？
- 出境移民与回归移民如何影响原地区的政治行为和权利关系？

涉及移民接受国的有：

- 入境移民的劳务市场以及移民的社会地位如何？
- 入境移民和其他少数群体在经济、社会、

文化参与方面享有哪些权利？

- 入境移民和少数民族是否形成特殊的社群？
- 入境移民子女的教育情况如何？教育对文化的维持、整合以及社会流动有何影响？
- 入境移民和少数群体妇女是否遭受歧视？他们在社区内及政治上有何反应？
- 多数人口与少数群体间、少数群体与少数群体间发展起了什么样的关系？
- 入境移民对国家认同以及政治体制有何影响？

涉及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关系的有：

- 以移民为基础的国际交通网络能否观察得到？这些网络有哪些特点和影响？
- 移民与国家间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关系如何相互影响？
- 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和超国家机构的出现？

在研究方法上，APMRN 反对以往忽视性别、年龄及代际变化的做法。研究者们需要考察移民和群际关系各个方面中的妇女地位、家庭角色、社群网络，将这些问题作为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核心；还要考察基于性别、族别的劳动市场的分裂，因为在分裂的劳动市场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移民都处于不利地位。需要搞清楚的是，第二代移民是否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

## APMRN 的工作计划

APMRN 设有机构的国家，其文化与经济情况各异，至于研究能力的大小，获得资料的难易，从前研究成果的有无，各国情况也不尽相同。网络制订了一项五年四阶段工作规划。



### 第一阶段:网络的建立(1995—1996年)

最初的工作是在各国参加者之间建立联系。已经建立了电子邮件网、国际互联网以及要闻简报④。要求每个国家的主要机构就关键政策准备一份论题大纲和研究题目。1996年在曼谷举行的APMRN第一届国际会议已经讨论了大纲。此次会议选举本杰明·卡立诺教授(菲律宾大学)为网络主席,苏邦尚塔瓦尼什副教授(泰国丘拉隆科恩大学)为副主席。国际秘书处设在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此外,还设立了负责出版、教育培训、图书数据库等事项的工作组。曼谷会议还设立了4个研究组:

- 移民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全球化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政策含义;
- 人口流动与环境;
- 国际移民与民族多样性;
- 国际移民与企业家活动。

### 第二阶段:发展本地区的研究能力(1996—1997年)

该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各成员国发展全国移民网络,并改进网络之间的关系。菲律宾移民研究网络(PMIRN)成立于1996年,并于次年2月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来自全国的学者参加了这个网络。各国政府和非政府间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个网络。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建立了同样的全国移民研究网络。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韩国也在就此课题建立全国性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些国际项目已经开始进行。研究组正在审定各种跨国比较研究方式。秘书处正为聘用研究人员、改善成员国研究基础设施筹措资金。1997年,日本基金会向APMRN捐款。秘书处还创办了《APMRN工作文件辑刊》⑤。1998年初召开的第二

届APMRN国际会议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此次会议回顾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并为下一阶段的项目按轻重缓急排列次序,设计方案。

### 第三阶段:关于移民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1998—1999年)

该阶段的重点将是全国及国际性的实证研究。这些项目将提出前面开列的研究问题以及涉及各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其他问题。每项研究都将是跨学科的,都需使用各种研究手段。

### 第四阶段:就研究成果、政策发展、改进移民管理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交流信息(2000年)

研究成果将以报告、论文、著作等形式发表;将建立国际工作站开展比较研究;将为研究成果的使用者(政治家、官员、记者、非政府间组织代表)举办全国和国际讨论会,探讨研究的政策含义;将争取使与移民管理以及民族文化多样性相关的问题成为大学学位及培训课程的内容。计划在2000年召开一次“亚太地区移民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与政治”的重要国际会议。

## 关于亚洲移民问题的展望

APMRN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公众对移民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缺乏了解。对许多亚太国家来说,国际移民是晚近才出现的事情。他们更留意短期的问题,如边境控制、劳动力市场影响等等。一些政策制定者不愿关注移民潜在的社会、文化、政治影响,因为那将意味着承认永久定居的可

能性，而这是与通行的意识形态相悖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愿意支持 APMRN 组织的上述研究。国际上以及大多数成员国资金不足，也妨碍了网络的发展。不过，一些政府和捐助人提供了支持，使几个领域的工作得以进行。APMRN 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让社会普遍了解本地区移民及其定居的前景。

亚太地区公众对移民的态度与过去西欧招募“客工”的国家有相似之处。政府不愿为可能出现的定居未雨绸缪，是因为根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些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在踌躇了 20 年之后才正视定居与新少数民族的现实。亚太地区的关键问题是，长期定居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未来又将如何？这个论题在多数亚太国家还是一种忌讳。

一个国家长期人口外流，永久失去大群的国民，可以说是“国耻”——无异于承认本国人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这在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永久定居美国的菲律宾人，他们可以被视为游子，与祖国藕断丝连（即使成了美国公民），但也可以视其为叛国者——祖国正在发展，他们却撤走了自己的精力和技术（阿居拉，1996 年）。国家为摆脱困境，一个办法就是为这些去国者创造一种说法。早在 70 年代，菲律宾语中就有“Balikbayans”一词，意思是“回归菲律宾的人”。政府为了使他们回国，曾采取若干措施，包括专门的旅行手续、纳税优惠、进口特许证等等。“Balikbayans”可以是海外合同工，也可以是永久定居美国的人，甚至还可以是非裔美国公民。

Balikbayans 这个词的用意，是让菲律宾出境移民保持一种菲律宾的民族感，这种情感被认为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好处。以此种方式承认游子，暗含了民族不

等于版图的意思：居住国外甚至成了他国公民仍然可以享受自家人的待遇（布兰克，1996 年）。由此我们想到当代移民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国际通信网络的出现，它通过家庭、经济、感情等各种纽带把移民同他们的原在国联系起来。全球化趋势（交通通信的改善、主导文化价值的扩散）导致了新的跨文化的归属与认同（巴特，1994 年）。这一趋势对要求忠诚不二的民族国家模式提出了挑战，需要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这样一种新模式，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人对一个以上社会的参与问题（包博克，1994 年）。

亚洲移民入境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相信，只要守好边境，强迫外来工人“轮班”入境，就能避免欧洲那些“客工”国家的遭遇。诸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防止“客工”定居。但对高速增长、充分就业、本国工人有机会向上流动的经济来说，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是一个长久性问题。雇主绝不肯放弃有经验的工人，于是施加压力以延长工作许可年限。而移民工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与雇主做出调整的趋势，则可能使他们长期逗留异国，并最终在那里安家。

移民入境国家如果承认移民永久定居的可能性，无异于正式考虑国籍与民族认同问题。像日本这样追求民族单一性的国家，就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许多朝（鲜）裔——殖民时期招募劳工的产物——已经是第三、第四代移民了，却仍然难以获得日本国籍，依旧是与世隔离、低人一等的少数群体（埃斯曼，1994 年）。拒绝赋予长期移民以选举权的法律，今年在法律上遇到了挑战。在涉及朝裔少数民族权利的“Kimu 地方选举案”中，日本最高法院于 1995 年裁定，宪法未授予但也不禁止授予外国居住者选举权，因此这项权利可以通过立法授

予⑥。如果外国居住者的权利能够通过法律和立法程序得到扩大,无疑会影响置官方政策于不顾而日益增长的其他移民群体。

对亚太地区移民入境和定居的前景,难以做精确的预测。显然,更大的人口流动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多次移民的出现是由于不同地区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政治因素、环境变化也是原因之一。这些因素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即使消失了,人口也还是要流动,因为人口流动与增长的国际资本、商品和观念的流动这一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密切相关。国际化既是经济也是文化现象,它对所有加入其中的社会都有着长久而不可逆料的影响。

国际移民既是地区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造成社会政治进一步变化的因素。目前,限制流动、防止定居的政策收效微乎其微。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看来会走上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道路(如同欧洲、北美国家所走过的)。盲目过滥的定居,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分裂。避祸之道在于正确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为制定政策提供现实可行的指导。这就是 APMRN 为自己布置的任务,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有效管理社会转型提供社会科学基础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黄纪苏译]

## Notes (注释)

1. The history of Asian migration is well covered in various articles in Cohen (1995).

2.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statistical data on Asian migration are still quite underdeveloped. The best single source is th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i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Cohen (1995) also has a number of useful articles.

3. The national co-ordinators and institutions as of mid-1997 are:  
Australia: Professor Stephen Castles, 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Fiji: Professor Rajesh Chandra, Geograph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Suva;

Indonesia: Dr Agus Dwiyanto and Dr Jeremias Keban, Population Studies Centre, Gadjah Mada University, Yogyakarta;

Japan: Professor Toshikazu Nagayam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re, Nihon University, Tokyo;

Malaysia: Professor Shamsulbarhriah Ku Ahmad, Population Studies Unit, and Dr Azizah Kassim,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New Zealand: Professor Richard Bedford,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Waikato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Paul Spoonle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Massey University;  
Philippines: Professor Ben Cariño,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r

Huang Pi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Republic of Korea: Professor Hyunho Seok,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g Kyun Kwan University, Seoul;

Singapore: Dr Yap Mui Teng,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Thailand: Dr Supang Chantavanich, Asian Research Centre for Migratio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efore Hong Kong became part of China on 1 July 1997,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also a national co-ordinator.

4. Information by email can be obtained from  
APMRN@uow.edu.au  
The Website address is: <http://www.uow.edu.au/arts/cms/cmsshome.html>

5. APMRN Working Paper No. 1 *Migration Issues in the Asia Pacific* was published in 1997. It is available from the APMRN Secretariat,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 or from UNESCO-MOST, Paris.
6. This decision is considerably more liberal than one by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on a similar issue in 1990.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BELLA, M.I., 1995. 'Asian migrant and contract workers in the Middle East'. In R. Cohen, (ed.),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18-23.
- AGUILAR, F.V., JR., 1996. 'The dialectics of transnational shame and national identity',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 44:1-4, pp. 101-36.
- AMJAD, R., 1996.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on the way to a migration transit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2-3, pp. 339-66.
- APPLEYARD, R.T., 198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Y. Appleyard (ed),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is: OECD.
- BASCH, L.; GLICK-SCHILLER, N.; BLANC, C.S., 1994.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 BATTISTELLA, G.; PAGANONI, A. (eds), 1992. *Philippine Labor Migration: Impact and Policy*. Quezon City: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 BAUBÖCK, R., 1994. 'Changing the Boundaries of Citizenship: the Inclusion of Immigrants in Democratic Polities'. In R. Bauböck (ed.), *From Aliens to Citizens*, Aldershot: Avebury, pp. 199-232.
- BLANC, C.S., 1996. 'Balikbayan: a Filipino extension of the national imaginary and of state boundaries',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 44:1-4, pp. 178-93.
- CASTLES, S.; MILLER, M.J.,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Guilford Books.
- COHEN, R. (ed.), 1995.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SMAN, M.J., 1994. *Ethnic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AWCETT, J.T.; ARNOLD, F., 1987. 'Explaining diversity: Asian and Pacific immigration systems'. In J.T. Fawcett and B.V. Cariño (eds), *Pacific Bridges: the New Immigration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New York: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pp. 453-73.
- HUGO, G., 1994.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Vienna: United Nations, Occasional Papers Ser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 no. 12.
- HUGUET, J.W., 1995. 'Data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1990-94',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4, pp. 517-27.
- KRITZ, M.M.; LIN, L.L.; ZLOTNIK, H. (eds), 199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IM, L. L.; OISHI, N., 1996.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of Asian wome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1, pp. 85-116.
- MARTIN, P.; MASON, A.; NAGAYAMA, T., 1996.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the dynamics of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 pp. 2-3.
- NMAC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1995.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Next Steps Towards and Beyond 2000*. Vols I, II, Canberra: AGPS.
- OECD Sopemi, 1995.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94*. Paris: OECD.
- SKELDON, R., 199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in and from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 review essay',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 pp. 19-63.
-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1995.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NG, D., 1996.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1, pp. 117-38.

参与当地的决策程序及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等问题。

本文还探讨了启动该研究项目的一些理论根据,涉及下面两个问题:(1)当前为何需要对移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参与”模式进行政策取向型的比较研究?(2)为什么城市应当是进行这项研究的重要层面(但人们一直未予重视)?本文以欧洲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举措为例,描述了已经出现的让“移民-少数民族群体”参政议政的各种地区性框架和制度,并把这些框架和制度各自不同的目标、所采取的不同的代议制形式,以及各自存在的问题加以介绍。本文后半部分从目标、工作方法、参研者的有关情况、研究经费的筹集、预定工作进度以及该研究的宣传方式等几个方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MOST 研究计划作了介绍。

[张大川译]

### 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权利的空间

阿里斯戴尔·罗杰斯

“欧洲城市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公民权利的模式”是一项跨国的比较研究项目,它是 UNESCO 主持的社会转型管理(MOST)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吸收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好几个学科的见解。本文对近年发表的地理学著作中与这一项目有关的四个题目的文献进行了评论。这些题目是:政治和地域尺度的生产;城市治理新网络的出现;公共空间对行使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多元文化城市之规范的-意识形态的模式。本文以欧洲、北美和澳洲一些城市为例来说明这些思想。

[仕琦译]

### 亚太地区新移民:促进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

斯蒂芬·卡斯尔斯

当代亚太地区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国际移民的快速增长。人口流动有各种形式,包括永久定居、短期劳务移民、高技术人员流动、难民流动以及家庭团聚。移民的目的地包括北美、海湾国家,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虎”国——流入该地区的移民正日渐增加。很多移民并未记录在案,女性移民的比重正在增大。以往的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移民的短期经济影响以及规范方面。但移民实在很可能成为该地区社会政治变化的主要原因。移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常常使得官方控制移民的政策难以实行。正在发生的计划外定居对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都产生重大影响。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学者建立了亚太移民网络,旨在研究这些问题,引起公众对移民问题的关心,并为政策制订者出谋划策。网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项目的一部分,本文介绍了它的目标和取得的进展。

[黄纪苏译]

### 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冲突与建国

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

民族问题是阿拉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在多民族的阿拉伯国家,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新生的现代疆域国家(country state)体系以及阿拉伯的知识界都未能理解和直面对待民族问题。从一开始,由殖民主义接生婆之手剖腹催产,诞生了不少严重畸形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前期进行的开明试验得以继续,或在中断的一二十年后得以恢复,许多早期的社会经济